



2025年7月12日

星期六

新闻热线:38166899

眉山网:<http://www.mshw.net>

丁公石祠记

□山东日照 李本亭

因为参加“苏轼与五莲”文旅融合交流活动，陪同与会的省内外专家学者考察，我再一次充当讲解员，陪同专家学者们参观白鹤楼遗址、丁公石祠，讲述苏轼和丁氏父子的文脉渊源、九仙山乃至五莲县（山东省日照市）的文化底蕴与传承发展。

一处遗址，凝聚着一段历史故事；一个村落，编织着一串文化密码。在九仙山东南麓有白鹤楼遗址，崖壁镌有“白鹤楼”摩崖石刻，落款“熙宁九年九月轼”，为苏轼于宋神宗熙宁九年（公元1076年）知密州时所题，今五莲县区域当时为密州所辖。苏轼知密州二年，留下了超然台、盖公堂等胜迹，五莲有幸，亦得旷世文豪题书“白鹤楼”，让九仙山白鹤楼得以名垂千古。

苏轼去后，白鹤楼沉寂了500多个春秋，直到明代万历年间，另一位“鹤鸣之士”丁惟宁追寻苏轼遗迹来到这里。在这里，丁氏父子和白鹤楼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在白鹤楼下建起了闻名遐迩的全石建筑——“柱史丁公祠”（亦称丁公石祠），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，让秀丽的九仙山更加迷人。

丁惟宁，字汝安，又字养静，号少滨，别署少滨主人，诸城人，明嘉靖进士，学识淹贯，工诗文、善书法，历任河北清苑、山西长治知县、四川道监察御史、湖广郧襄兵备道副使等官职，是明嘉靖、万历年间一代鸿儒、著名清官。丁惟宁秉性耿介，为官清正，在湖广郧襄兵备道副使任上因受诬陷无辜遭贬，拂衣归里，隐居于九仙山东南麓。

年轻时的丁惟宁，才华横溢，雄心万丈，很想在官场干出一番事业。但由于性情耿直、不阿权贵，官场之路自然走得艰难。对政治的黑暗失望之下，辞官归隐也就成为一种必然。归隐山林，这也是在晚明政治黑暗的时局下，中国士大夫不甘同流合污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。

据史书记载，丁惟宁性格刚直、不阿权贵、遇事敏锐，在山西长治县令任上时平抑豪强、革除弊政，离任时万民空巷夹道相送，后长治百姓为之立祠纪念；任御史巡按直隶时，拆除了大太监冯保的生祠，释放了因白莲狱案株连的无辜百姓千

余人，百姓为之拍手称快。丁惟宁为官清正，三任要职，但每次归里，随身行李仅图书而已，别无长物。辞官归里后，当地官吏虽欲结纳，却经年不得一见。县令使公人送八百两银子至门，说是旧例皆然，丁惟宁坚辞不受。他在西园种韭数畦，售于市集，有人嘲笑他辞金不受而求利于韭，他说：“官银非吾所有，圃蔬自食其力”，闻者皆叹服。丁惟宁奉亲至孝，每逢父母忌辰，必着白衣而斋素，室内悬父母像，朝夕相拜，乡人无不崇敬。丁惟宁秉持清风传家，这一家风贯穿于他的一生，也以此教育自己的子女。丁惟宁虽做过高官，但家中仍居草房，后因房子太过破旧才同意修葺，家人便借机把房子盖大一些，梁栋都已架好。丁惟宁知道后，立命木匠截柱，曰：“无示子孙侈也。”丁氏家族绵延发展数百年，官荫名士辈出，这与其崇廉尚俭、低调严正的家庭风范不可分。

“凤翫高骞侍从班，羽仪方仰忽投闲。削成丘壑疑天外，领就烟霞出世间。永誉自了高月旦，神游从此托仙山。独余千里瞻依在，遥见云头鹤往返。”这首《山中即事》，为丁惟宁辞官归隐九仙山白鹤楼下时所写。诗中对九仙山的风景不吝赞美，而其坎坷的仕途经历也见诸笔端。从诗中可以想见，作者曾经意气风发名列朝班，然而时间未久便因居官清正为上司所忌，无辜遭贬退隐山林，寄情于山水之间。诗句清丽洒脱，很有大家风范，唯有一股郁郁不平之气通篇流转，让人心生叹惋。

隔壑并峙的五莲山、九仙山，如一道天然的屏障，又如伸开的两臂，将白鹤楼、丁公石祠和丁家楼子村拥在怀中。九仙山四季分明，春来杜鹃满山，径幽而香远；秋至草木斑斓，天高而水清。丁家楼子村北面的万寿峰、老母阁、梳洗峰、观音峰等山峰峻拔嶙峋，烟云缥缈，万寿峰状若巨佛，是九仙山的主峰，峰下有宋代古刹净云寺遗址。丁公石祠位于丁家楼子村前，依山傍水，风水绝佳。

白鹤归华表，青山作主人。官场失意的丁惟宁在九仙山找到了自己的桃花源，他在白鹤楼下背倚九仙山结庐，“昼憩树下，夜宿草庐，扶杖逍遥于烟水之间”。他

沉浸在山光水色里，与文友们切磋诗艺，也给童蒙的子侄课业。他倾听自然的天籁，创作出《山中即事》《观海行》《登北极台怀旧》等诗文，均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。万历三十六年（公元1608年），丁公长子耀斗得知父亲有去世后长眠于此地之意，于是伐石作室，建石室三间，以石之坚固，以期长存于天地之间。万历三十九年（公元1611年）丁惟宁去世，丁耀斗兄弟将石室辟为祠堂，迎丁公神主供奉于石室之内。从此，丁公石祠与白鹤楼一起，成为这方土地独特的文化符号。

而今，白鹤楼仅存遗址，但丁公石祠历400多年风雨，犹壮丽如初。因苏轼与白鹤楼的缘故，丁惟宁选择在这里隐居，后来，就有了丁家楼子村。

“独余千里瞻依在，遥见云头鹤往返。”许是因为白鹤楼的缘故，在丁惟宁的笔下，多次出现“鹤”的踪迹。丁公祠内石壁上镶嵌的九方明代诗文碑刻，也一再将丁惟宁比拟为《搜神后记》（陶渊明著）中化鹤归来的“丁令威”，或为与白鹤为友的世外高人。

追根溯源，白鹤楼，是这一切的源头。

高洁的白鹤，成为高士丁惟宁的化身，连同他的儿辈们，也与白鹤难解难分。

丁耀斗，丁惟宁的长子，字虹野，崇祯己丑生，诰敕内阁中书舍人。他有个雅号——“白鹤楼居士”，还摹写了苏轼“白鹤楼”题刻，与白鹤楼的缘分可谓深矣。丁公石祠石坊两边的石柱上，刻有“一咏一觞百年之逸兴；勿伐勿剪千载之遐思”楹联，落款“不肖男耀斗述”“少滨主人题”，可知上述文字是丁耀斗撰述、丁惟宁手书。

在这副楹联里，丁耀斗化用了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“一觞一咏，亦足以畅叙幽情”和《诗经·召南·甘棠》“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”两个典故，喻指九仙山之风景堪比“兰亭会”的会稽山，既形容了丁公退隐林下、寄情山水的超然物外，让后人遥思丁公不慕名利的豁达胸襟，又借召公“甘棠遗爱”之寓意，彰显丁公之德政。

我们要感谢丁耀斗，正是他为丁公筑石室、立石坊于九仙山下，而且摹写苏轼“白鹤楼”题书并镌刻于石壁之上，这才有了“柱史丁公祠”这一光耀千秋的文化古迹。

迹，也让苏轼“白鹤楼”遗迹更加熠熠生辉。

丁耀亢，丁惟宁的第五子，字西生，号野鹤，又号紫阳道人、木遁道人，是著作等身的九仙诗人、著名文学家。鹤居林野，品性高洁，常以之喻高人隐士。“萧然野鹤姿，谁复识中散。”（苏轼《李宪仲哀辞》）。丁耀亢倜傥不羁，怀才不遇隐逸林泉，其号“野鹤”，风骨于中可见一斑。

丁耀亢是清代诸城“开一邑风雅之始”的著名历史人物，一生著述宏富。康熙六年（公元1667年），他登上超然台拜谒苏公祠，赋诗《登超然台谒苏文忠公有感》：“穆陵霸气尚纵横，台畔遗文记典刑。物有可观皆可乐，人能超世始超名。旧河沙岸翻为谷，官署归鸦不入城。我著瓶梅君咏桧，古今分谤愧先生。”在诗中，可以看出丁耀亢对苏轼“无往不乐”“超然物外”精神和德政遗爱的景仰追慕之情。

“神物龟翻孔，仙才鹤姓丁。”（李商隐《寄太原卢司空三十韵》）因白鹤楼而至，以鹤而名，丁氏父子三代皆鹤缘深厚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“东望五莲西九仙，鼎峙并成三不朽。”（张献之《送丁先生藏主山中》）。丁公石祠是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，以石室之坚固，当与五莲山、九仙山一同长存于世间。

400多年过去，石祠经受社会变迁和风雨侵蚀，依然保存完好，壮丽如初。“识者谓当为亿千年物，而公之德又足以永之，虽与此山并存可也。”（王化贞《柱史丁公祠记》）。睹物思人，不由让人惊叹古人的智慧。

高风与孝思，千载共山青。丁惟宁仕途坎坷，不得志而归隐林泉，但他的德政和风骨，已与坚固的石祠一样不朽，与巍巍青山魂魄共之。苏轼“白鹤楼”题书和丁公石祠，犹如一座文化地标，让五莲山有了厚重的文脉传承，光耀千秋。

（李本亭：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政协科教文史委主任，潍坊市苏轼文化研究会理事，日照市作家协会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。编著有《五莲山志》《五莲九仙宝地》等书籍，在《人民日报》等报刊发表《苏轼与日照》《苏轼：密州三章》等作品。）

主编 吴晓彬 编辑 万君
美编 李燕 校对 肖倩

噜鱼池

三苏祠船坞

□四川眉山 张世明

木纹浸透北宋的水声
一叶停泊千年的孤舟
压着千堆雪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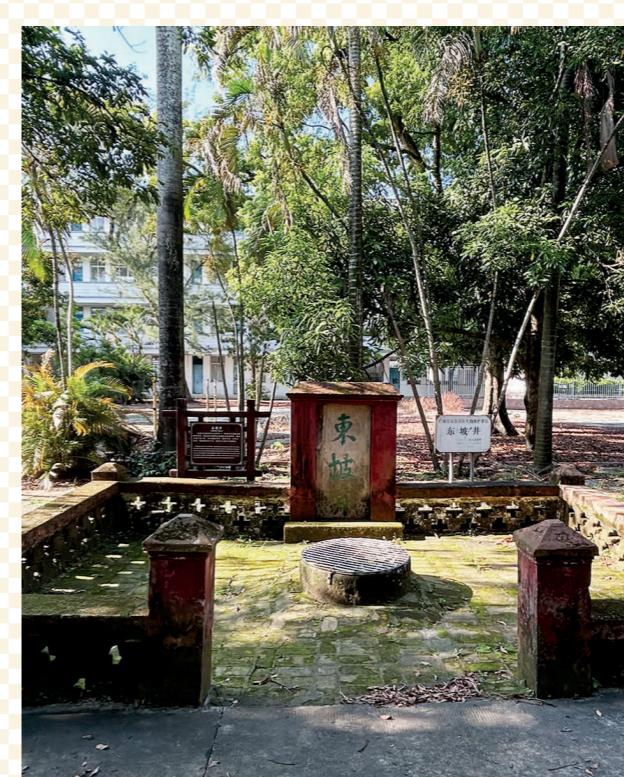
回忆，在风中生根
每首诗每阙词都潜入水底
静候，一双芒鞋乘坐弦月
踏上新的征程

当墨色随云帆淡去
玻璃江屏息凝神
铺展一张恣意挥毫的宣纸

我们，一直在临摹
风的撇捺，雨的提按
和半生颠簸的平仄

直到有人，说一声
起锚——
整条长江便以酒醉的狂草
书写：大江东去……

（张世明：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。诗文散见《绿风》《星星》《诗歌月刊》《诗潮》《星火》《散文诗》《中国诗人》《四川日报》等；著有诗集《蓝色村庄》等5本。）



广西合浦东坡井。

蒋蓝 摄

苏轼的成都故事

□四川成都 蒋蓝

唐宋以降，成都大慈寺一带一直是民间高人的“市隐”场所。箍桶手艺乃“匠之末技”，渴望在卑微职业（比如裁缝、屠夫、箍桶匠）中升腾起大智慧，一直是渴望“深入生活”的主流者们的狂想。北宋王辟之《渑水燕谈录》记：“成都谯开，博极群书，而不求荣利，简静冲退，好修身之术。日游大慈寺，博访异闻，以广所学。久为蜀中士大夫所称。文同与可尤重之，目曰大慈仙。”文同不但娴熟于蜀地文化，而且一度在成都生活，说法可信度极高。

宋代理学家程颐、程颢年轻时随父入蜀，在成都大慈寺门口，“见箍桶者口吟易数，就揖之，质所疑，酬答如响，此儒而业于匠者也”。看来蜀学的最大特色就是易学，“易学在蜀”是程颐得出的结论。腿脚奔忙的力役之事，贤者在所不免，桶匠中也有高人啊。传授他们《易经》精髓的桶匠，名字没有留下来，但低微的职业身份暗示了理学家“礼贤下士”的品德。

宋至和三年（公元1056年）春，苏轼与苏辙跟随父亲进京应试，路过成都，兄弟俩第二次游历了大慈寺。这距离他们第一次游历大慈寺结识宝月大师惟简，仅过了一年。

宋至和二年（公元1055年），苏轼第一次随父入成都，带着其新作“正统三论”拜见益州太守张方平。张方平一读其文章，便以国士之礼待之。苏轼《乐全先生文集叙》云：“某年二十，以诸生见公成都，公一见，待以国士。”这一细节，充分彰显了北宋清正刚直、唯才是举的风尚。

苏轼在成都大慈寺市场，得到（买到）一个出自滕大师之手的神奇瓦砚，后来送给弟弟子由。子由很高兴，后来为此写了一篇赋。其叙云：“先蜀之老有姓滕者，能以药煮瓦石使软，可割如土。尝以破瓶酒缸为砚，极美，蜀人往往得之，以为异物。余兄子瞻尝游益州，有以其一遗之。子瞻以授余，因为之赋。”

碎瓦缸如何变成砚台呢？这显然是异人滕公的江湖杂技手段，众目睽睽之下，“瓦缸”被赋予了异乎寻常的成都神力。时值春节，市场异常繁华。这次“三苏”到成都后，时间要从容一些，他们主要是观赏壁画，特别是对极乐院里著名的佛画家卢楞伽的画作尤为关注，赞不绝口，称之为“精妙冠世”。

目睹精美壁画后，苏轼跃跃欲试。

他感念蜀守张方平的知遇、举荐之恩，在千年古

刹刹净众寺画了一幅张方平像，留于寺中。苏洵大喜，为此画作了《张益州画像记》，并写了《上张侍郎书》云：“二子轼、辙，闻京师多贤士大夫，故往从之游，因以举进士。洵今年几五十，以懒钝废于世，誓将绝进取之意。惟此二子，不忍使之复为湮没弃置之人。今年三月，将与之如京师……”这幅画像，后存成都净众寺“张文定公祠”。

在绘画史上，苏东坡的最大功绩是对中国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令人惋惜的是，这幅画作未能流传下来。

治平四年（公元1067年），苏轼、苏辙扶苏洵、王弗灵柩回眉山安葬。守孝三年后，熙宁二年（公元1069年），苏轼返汴京路过成都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成为他此生与蜀地的诀别。他游览成都，曾寄住成都西郊清音河畔“悦来客栈”，并在一棵大树下品茶会友。相传他临走时，出资在清水河上修了一座青石拱桥，后人取名“苏坡桥”，建东坡亭以为纪念。

晚清诗人周济曾写诗描绘：“西出送仙桥，青羊闻鼓声。浣溪绕草堂，东坡月黄昏。”“书圣遗踪东坡亭”曾与青羊宫、文殊院、武侯祠同列“成都十景”之一。但无论是东坡亭还是苏坡桥的古迹，现皆已不存。今人为纪念这位大文豪，在苏坡东路与三环路交叉处，建起了一座“苏坡立交桥”；桥下精心打造了“川剧长廊”，能欣赏到各色川剧题材的现代装饰画与浮雕作品，呼应着桥名的文化底蕴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。距王弗染病身亡十年后，恰逢妻弟王缄从眉山到钱塘看望苏轼，苏轼写《临江仙·送王缄》：

忘却成都来十载，因君未免思量。凭将清泪洒江阳。故山知好在，孤客自悲凉。

坐上别愁君未见，归来欲断无肠。殷勤且更尽离觞。此身如寄舍，何处是吾乡。

成都、眉山、峨眉山等，不仅成为苏轼的乡愁符码，还成为他动荡命运的“压舱石”。他不是不知道吾乡何处，而是感叹宦途中的自己，命若飞蓬……

（蒋蓝，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，四川省作协副主席，四川大学文新学院特聘导师。已出版《苏东坡辞典》《成都传》《苏母传》《苏东坡传》等专著多部。作品入选上百部当代选集。）

